

檢視民進黨之中國政策

紀舜傑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2012年是民進黨總統大選敗選年，也是中國熱的燃起年，有高層人士訪問中國，有研究中國的單位成立，有整合中國政策的平台架起。大家似乎希望平心靜氣一些來認識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民族、國家、和文化。本文以未來學的理論和方法「多層次因果分析」，來解析民進黨中國政策。並以四個未來的可能途徑，分別為一切照舊，第二是成長，第三是崩壞，第四是轉型，討論民進黨與中國互動之可能情境發展。結語為民進黨應摒除對中國互動之焦慮感，釐清中國政策之長期目標，切勿盲目地以中國政策為總統大選敗選主因為由，在未確立定位與策略之前，急於與中國交往。

關鍵詞：2012 總統大選、民進黨、中國政策、多層次因果分析

壹、大歷史掃瞄

首先，我們試著以大歷史的觀點來檢視當前的兩岸發展，之所以以大歷史的觀點，主要希望跳脫當代的人事糾葛，不以個人功過為主軸來看待歷史的進程，嘗試以後代眼光和時空回看當前的事件，重新詮釋歷史的演進。就像以開啟中國統一的歷史新頁，和奠定統一為常態或是可追求的目標來看，秦始皇的歷史地位就不應該只被焚書坑儒、暴政必亡的目的性歷史評價所扭曲。又可以大歷史看2001年發生美國的911事件，對世界長遠的影響不在那喪失性命的數千美國人，而是在伊斯蘭世界被逼入恐怖主義的形象裡，也在反恐變成國家暴力的正當藉口，在個人人權的保障上，911事件倒退很大段的距離。

已故的歷史學家黃仁宇(1985)以大歷史分析近代中國的發展，提出中國近代沒有形成一個可以數字化管理的社會，是中國未能與西方並駕齊驅發展現代文化的關鍵因素，他提出的數字管理，乃參照五百年來西方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發展的主軸，指出四大基礎為保障私權、市場交換機能與信用、任用專業經理人、基礎建設與法律。

中國缺乏法治、法制的特性，也是中國沒有發展出民主社會的重要因素。中國人在儒家思想服從權威和追求和諧的原則下，沒有遇事召開會議，以多數決之習慣制度，在和諧、團結的道德約束下打擊異己，缺乏近代法律上之民主，特別是缺乏個人本位權利觀念。

另外，英國人類社會學家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提出文化的三個層次論：器物、制度和組織、精神或倫理價值。最低的器物文化指的是能看到的各種有形的物質，例如刀槍武器、交通工具、飲食器具等。第二層次的制度和組織即是如銀行體系、教育體系、政治體系等。最高的層次則是行為規範、好壞、對錯的價值判斷標準(Malinowski, 1944)。中國人對中國文化的驕傲在清朝末年，因為西方列強入侵而動搖，甚至是鄙棄。傳統與創新、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主體地位變成恢復中國光榮歷史的主要之爭執點所在。然而清廷官員雖驚覺與西方國力的殘酷差距，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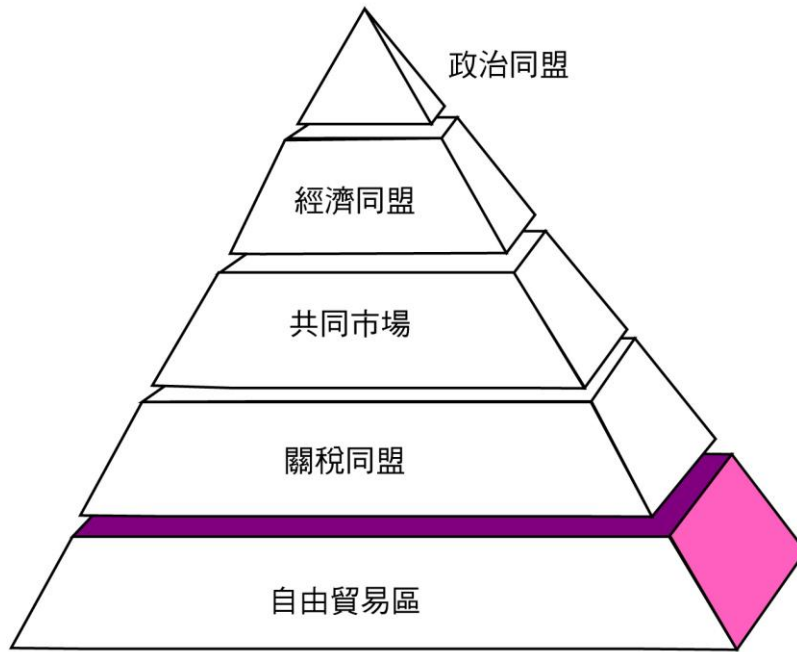
仍自大高傲地認為只是在器物層次的落後，所以趕上西方的船堅砲利就可迎頭趕上。因此採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態度，顯示他們不知西方已經在更高的制度和價值層面上，引領人類的前進。

近幾世紀因為歐洲工業革命讓人類的科技發展和物質文明突飛猛進，但也讓西方掌握了現代性的內容和標準，科技發展高低成為評判文化優劣的依據，人類社會因此區分已開發、開發中、和未開發國家，相互因果作用，於是文化高等和低等的判斷理直氣壯。來自西方的民主價值變成世界普世的價值，而其他文化則辛苦地追隨或對抗。從清末的圖謀自強而發起的洋務運動開始，進入唐德剛（1998）所說的中國第二次轉型，第一次轉型指的是從商鞅變法至秦皇漢武，費時約 300 年，由封建制度轉變為帝王制度，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廢井田、開阡陌，是政治、社會到文化面的徹底變革。而這第二次轉型則是自鴉片戰爭開始，歷經自強運動、變法維新、國民革命、五四運動，尋求轉向西方民主體制的西化運動，而此項轉型至目前尚未完成。

那以大歷史來看當前，什麼是不可逆之歷史洪流？全球化是、隨身通訊科技裝備將宰制人們的生活、二十世紀資本主義戰勝共產主義、民主體制被最多人接受、區域整合、經濟整合都是。以圖一的整合圖來看，前四階段的整合如火如荼地進行中，但最頂端的政治同盟整合卻不是。在冷戰結束後，以意識型態根基的政治結盟，隨著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集團而瓦解。那台灣是否走在順勢歷史大潮流，還是逆求反潮流？

貳、民進黨之回應

民進黨中國政策是台灣近一年來的焦點話題（以此關鍵字搜索 google 網站，出現超過 5,280 萬筆的網頁資料（2013/3/19）。台灣的政治光譜不再是只有綠、藍兩大塊，紅色勢力以無可抗拒的聲勢進入兩大陣營的主戰場。2012 年是民進黨總統大選敗選年，也是中國熱的燃起年，有高層人士訪問中國，有研究中國的單位成立，有整合中國政策的平台架起。大家似乎希望平心靜氣一些來認識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民族、國家、和文化。



來源：于卓民、巫立宇、蕭富峰 (2009)。

圖 1：經濟政治整合層次圖

對於民進黨之中國政策，各界討論甚多，近來的爭議在 2012 大選敗選後，蔡英文將與中國交往除罪化，除紅帽化，本來就鼓勵應該正常交往，只是敗選突然變成打開中國的政策櫥窗 (policy window)。

蔡英文在擔任黨主席期間，曾公布民進黨的中國戰略，包括 (1) 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是：互惠而非歧視、和平而非衝突、對等而非從屬，使台灣不可陷於中國設計的一中框架。(2) 從全球戰略平衡及區域安全的角度來思考台灣與中國的關係。(3) 以民主原則作為對外的防火牆，對內的防腐劑，中國政策的制定與執行須遵循民主程序，重大事項也必須由人民公投決定。(4) 民進黨堅持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作為與中國的最大區隔，並作為外交的戰略高點 (自由時報，2010)。

謝長廷被視為是民進黨內部的智多星，在 2000 年擔任高雄市長時主張高雄與廈門是一個國家的兩個城市，後來提出憲法共識 (或憲法各表)，認為民進黨必須遵守中華民國憲法，不應再談制憲。謝長廷強調，遵守憲法

是朝野政黨最大公約數，他所倡議的「憲法各表」，是維持現狀的設計，兩岸現狀互不隸屬，但憲法有特殊關係，「憲法各表」更務實且有合理發展性（新頭殼，2013）。

蘇貞昌的中國政策態度：民進黨的立場，就是『台灣前途決議文』所描述的內容。他認為台灣社會最大共識是「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台灣是所有台灣人的台灣，台灣是世代代人的台灣」。同時『台灣前途決議文』提及，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依憲法名稱叫中華民國，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都必須經由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決定，「這就是民主，這就是具體顯現的台灣共識，這就是民進黨的共同價值。」（中國時報，2012）

叁、多層次因果分析

接下來，我們試著以未來學的理論和方法「多層次因果分析」（Causal Layered Analysis, CLA），來解析民進黨中國政策。CLA 在未來學裡既是理論也是研究方法，在理論層次它是企圖整合社會科學的實證、批判、文化分析、和行動研究的認知模式，認為人類的認知是垂直的活動，知識的根源來自歷史、文化、社會結構，呼應傅柯（Michael Foucault, 1973）所主張的「知識的歷史框架」（historical frame of knowledge），即各種知識都是在特定的歷史底下的產物。另外 CLA 也融合 Johan Galtung（1996）所主張的文明密碼（deep civilizational code），即要瞭解國際關係必須瞭解各國的文明根源（civilizational origin），例如不同文明對女人、他人、自然、歷史的觀點都不同。簡單地說，CLA 是對問題的深度剖析，對問題的成因和定義從最表面到最深層地抽絲剝繭，希望能找到最根底的密碼（Inayatullah, 2004）。

CLA 由上述理論基礎發展出的方法為，將問題的討論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稱為表象層（litany），在媒體上看到的統計數字、新聞報導、具有特殊目的事件宣傳基本上都是這個層次的論述方式。製造無力感、恐慌、責怪他人或事件當事人（政府官員或政治人物）。對問題的來龍去脈或基本假設都未能加以質疑或挑戰。第二層為系統層（systemic cause），會關注問題的系統性的原因，包括政治的、經濟的、環境的、歷史的、社會的、和

科技的因素。政府和各種事件關係人的角色會被探討，也會利用數據資料解釋事件，數據會被質疑，但是不會根本推翻其既定的框架，媒體的社論或分析性的文章大部分是這一層次的探討。

第三個層次是世界觀 (worldview) 的分析，探討支持和合理化特定事件的論述和世界觀。找尋超越當事人的深層的社會的、語言的、和文化的的原因。重新檢視或是重新定義問題之所在。重新解構我們對問題的認識。

第四層是隱喻 (metaphor) 或迷思 (myth)，這一層是深層和集體的原型的故事，是潛意識的和情感性的面向，提出大膽和訴諸感性的角度和觀點看待問題，所用的語言可能較不明確，但是希望刺激意象的想像，希望觸動人的心而不是人的腦 (感性大於理性)。

以上述四個層次審視民進黨之中國政策，在第一表象層的問題層次，我們看到中國政策和與中國的關係被視為是民進黨在 2012 年總統大選敗選的重要因素，各界在分析敗選原因時，傾向推論因為漠視中國的崛起，和台灣需要中國經濟的現實，使得民進黨無法獲得選民青睞。

進入第二層系統分析，我們看到議題提升至政治、經濟互動的拉扯，中國是否會真正開放改革？中國會進行民主化嗎？中國如果開展民主化，台灣與中國的統合是否應該展開，以往忌諱或是阻礙的因素會隨這中國開放改革而消失，即兩岸在意識型態和政治體制的差距縮小，統合工作就可開展？

在第三層世界觀和論述裡，我們看到黨內重要人士紛紛提出共識論述，然而現階段以『台灣前途決議文』為最大公約數，蘇貞昌也定調這就是民進黨的主要主張。此決議文清楚詮釋歷史，定位當前，也良性地展望未來。例如「經由民主進步黨與全民多年共同艱辛奮鬥，逼使國民黨放棄戒嚴與一黨專政，接受民主改革，達成 1992 年的國會全面改選、1996 年的總統直接民選、以及修憲廢省等政治改造工程，已使台灣事實上成為民主獨立國家。」此段敘述便是歷史與現在的延伸連結。對現狀的改變，也清楚指出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與中國的對應關係則是「台灣並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片面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與「一國兩制」根本不適用於台灣。」而在未來的發展上，「在全球要求和

解、穩定與繁榮的氣氛下，台、中雙方不可能永遠自絕於時代潮流；兩個在地緣上相近、經濟上互利、文化上共源的國家，也不可能永遠互相仇視、互設門檻。民主進步黨中國政策的最終目標，是要和中國建立互惠而非歧視、和平而非衝突、對等而非從屬的關係。民主進步黨希望，中國政府能正視台灣人民的意願及台灣主權獨立的歷史事實，也希望中國人民能擺脫過時的民族主義及思想框架，真誠體會台灣人民要求獨立自主，在自由民主體制下繁榮發展的強烈意願。民主進步黨更希望，在即將到來的新世紀中，台、中雙方能拋棄猜疑與對立，從雙方在歷史上、文化上、血緣上的長遠關係出發，從地緣政治、區域穩定、經濟利益著眼，創造共生共榮、互信、互利的美好前景。」

這份當年為了消除台灣民眾對民進黨急獨所制定之決議文，本來被期望除了贏得 2000 年大選外，也可開展與中國的良性溝通交流，這是陳水扁的新中間路線的重要內涵。因此其內容應可視為務實、平穩，即使在今天的時空環境下，仍是不卑不亢的宣示。

多層次因果分析 民進黨的中國政策

| | |
|----------------------------|----------------------|
| litany 表象層 | 敗選因素、中國崛起 |
| systemic causes 系統層 | 政治體制差異、民主與極權、經濟依賴 |
| worldview/discourse 世界觀／論述 | 台灣前途決議文、一堆共識、從世界走入中國 |
| myth/metaphor 迷思／隱喻 | 92 魔咒、親密關係焦慮 |

圖 2：民進黨中國政策之多層次因果分析圖

至於第四層次隱喻或迷思，我們看到主要問題在台灣的未来在台灣，還是在中國？另外民進黨似乎遭受 92 魔咒，受困於到底有無 92 共識，為

了與堅持 92 共識的國民黨做出區隔，絞盡腦筋企圖提出另一個 92XX，這個是非題和填空題成為民進黨內部爭取中國政策主導權的通關密語。所以謝長廷企圖用憲法一中來突圍。國民黨用 92 共識獲得與中國的交往門票，民進黨不能也不願用同樣的票進場，這種親密關係的渴望和焦慮是重大迷思。

肆、時間觀的問題

再者，我們試圖以時間觀的角度分析民進黨的中國政策。時間觀的差異是人與人關係不睦或爭吵的主要因素，夫妻、親子、師生、甚至是政治人物的歧見都是來自對過去、現在、未來的著眼點差異。有人沈溺於過往，有人只重視當下，有人不切實際地寄希望於未來，堅持某單一時間觀經常容易形成錯誤的決策，也容易導致紛爭。因此，成熟、健康地在過去、現在、未來三個時間點上維持平衡，才能保持健全的生活。

未來學家 Richard Slaughter (2001) 認為人能夠同時認知和想像過去、現在、未來三個時間點的事物，這是非常特殊的能力，但是一般人都視為理所當然。美國心理學家 Philip Zimbardo 與 John Boyd (2008) 在其名著 *The Time Paradox* 中指出，「時間」是人們最關切的事，人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間觀的偏好不盡相同。過去對人們造成的影響經常是面對事件的態度大於事件本身，意即事情已經發生後，許多作為可能無濟於事，事件無法被改變，但是如何面對事件和建構回憶便可能有極大的不同結果。對過去的態度可能是悲觀負面或樂觀正面，前者可能走不出過去的陰影，嚴重影響對當下事務的態度，身心曾經遭受重大創傷的人很容易有此現象。對過去過度樂觀者，可能忽略過去值得現在警惕的經驗和教訓，也可能過於沈溺於過往，抗拒任何改變，或是因為過往的美好回憶而無法勇敢面對當前的現實 (Pluck, et al, 2008)。

在面對現在的時間觀上，可能有當下享樂派 (present-hedonistic) 和毫無希望派 (present-fatalistic)，一個人如果過度注重眼前的享樂而完全忽視未來結果的影響，則可能淪為過度享樂者，通常偷竊、吸毒、好賭、喜好

冒險者都是這類時間觀的結果。而對眼前感到毫無希望者，悲觀地認為任何做為都無法改變現狀，大環境的影響力主宰一切，個人的努力是無濟於事。

至於面對未來的態度，有一種只看上未來而不計眼前的極端態度，稱為先驗未來者 (transcendent-future)，他們追求的他們想像和計畫的美好未來，這部分本來不成問題，只是他們為了未來可以完全不管眼前，甚至不惜以眼前的一切去換取那個想像的未來，Zimbardo 與 Boyd 認為一些伊斯蘭恐怖份子的自殺式攻擊就是這類時間觀的產物，他們追求眼前這個生命以後的那個更美好的生命，而且認為只有經由犧牲或是跳過眼前這個生命才能達到，因此他們認為自殺攻擊行為是必要的而且是神聖的。

以上述的時間觀來看，馬英九屬於正面看待過去，漠視當前，寄希望于先驗之未來。因為馬英九拋棄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恩怨，將國共爭鬥六十年視為正向面對過往。現在的作為是釋放善意，不管代價多高，所有的回報都在未來，他押賭中國的崛起，以中華民族的強大為掩護，為了追求中華民族的光榮與世界的主導地位，當下的犧牲或是冒險都是值得的，也是在這種完全以未來為依歸的原則下，中國任何眼前的不友善或是充滿敵意的作為都會被容忍接受，因為希望都在未來，馬英九似乎都可以用未來的榮景加以掩蓋，只要持續對中國靠攏，這些問題將來都可以得到解決。這樣的想法不就像前面所敘述的先驗未來者，完全看重現在無法檢驗的未來，而忽略或是不管眼前的一切。

在民進黨的時間觀方面，與中國共產黨過去的恩怨不像國民黨那般糾纏，不但沒有肉身戰爭的血恨，也沒有實際交手的歷史仇恨，因此過去的包袱應該不甚沈重。在有的應該是現狀的打壓，在國際上壓縮台灣的活動空間，用外交手段打擊台灣的主體意識和主權，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制定分裂國家法。

或許在現狀下，民進黨與中國的交往不順利，因此種下難以破解的心結。例如控訴陳水扁卸任後的遭遇，完全歸罪於馬英九與中國政府的聯手陰謀 (袁紅冰，2012)。因此在阿扁無法獲得自由的情況下，相信上述論述的綠營人士對中國的仇恨難以消除。或許馬英九瞭解如果釋放阿扁，可能

加速深綠陣營與中國的和解，因此堅持繼續囚禁阿扁，繼續利用阿扁的情境製造綠營內部矛盾，以及綠營與中國進一步交往的障礙。

以未來時間觀而論，民進黨當然不至於如馬英九一般執著於先驗的未來，寄託所有希望於中國。但是該如何期待台灣與中國的未來？儘管台灣前途決議文清楚描述與中國的理想未來，但是苦於沒有與中國調和對話的機會，這似乎是現階段民進黨膠著的原因。總而言之，民進黨對中國的時間觀應該是無歷史包袱、但被現狀羈絆、而不知如何開創未來！

伍、未來三角：拉力、推力、重力

想像未來其實並非憑空臆想，而是尋找可能意象與途徑，進而勾勒所有可能的情境。因此在想像民進黨與中國的未來時，我們可以參考未來學者 Jim Dator (1998) 提供四個未來的可能途徑，首先是一切照舊 (business as usual)，第二是成長 (growth)，第三是崩壞 (collapse)，第四是轉型 (transformation)。第一可能情境是一切照舊，指的是民進黨與中國的關係沒有突破，也沒有倒退，還是抗拒一中原則，否定九二共識，雙方無法找到突破僵局的方程式，與中國對話的機會和權力還是在國民黨。

表 1：民進黨與中國之可能未來

| 一切照舊 | 成長 |
|--|--|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沒有突破，也沒有倒退。 2. 抗拒一中原則，否定九二共識。 3. 中國拒絕對話，僵持不下，雙方無法找到突破僵局的方程式。 4. 與中國對話的機會和權力還是在國民黨。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重新執政，取得與中國對話的官方立場。 2. 以台灣前途決議文維基本原則，獲得中國的讓步，願意拋開一中原則。 3. 在堅持台灣主權與主體性的前提下，與中國對話交往。 |
| 崩壞 | 轉型 |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反中勢力主導，幾乎與中國決裂。 2. 深綠勢力抬頭，在扁案的仇恨基礎上，新仇加舊恨，完全拒絕與中國對話交往。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民進黨完全放棄台獨黨綱，也不提台灣前途決議文，也不堅持台灣主權。 2. 接受一中原則，比國民黨更積極展開與中國對話交往。 |

第二種成長，可能是民進黨重新執政，取得與中國對話的官方立場。在民進黨現有的立場上，以台灣前途決議文維基本原則，獲得中國的讓步，願意拋開一中原則，在堅持台灣主權與主體性的前提下，與中國對話交往。第三種崩壞的可能發展是，反中勢力主導民進黨，幾乎與中國決裂，深綠勢力抬頭，在扁案的仇恨基礎上，新仇加舊恨，完全拒絕與中國對話交往。第四種轉型，可能是民進黨完全放棄台獨黨綱，也不提台灣前途決議文，也不堅持台灣主權，甚至是接受一中原則，比國民黨更加積極與中國交往對話。

最後，我們根據上述可能未來情境，以未來三角的方法分析，拉力指的是未來願景的追求，拉引行動者根據該目標前進的力量。推力指的是現階段推動往願景前進的驅動力，也可說是達成願景的有利因素。而重力則可能是存在於過去的傳統束縛，或是當下阻礙追求願景之不利因素。如果以上述民進黨的成長情境，將台灣前途決議文所描述的視為民進黨的願景，最好的情況當然是在此條件下執政，推動與中國關係的正常化。在推力方面，即將到來的 2014 年選舉和 2016 年的大選，為了贏得選舉，必須打通中國這一關是重要的驅動力。還有台灣在經濟上對中國的依賴，仍是現實上必須與中國維持良好關係的原因。另外民進黨內部重量級人士想到中國投石問路，類似當初泛藍陣營的爺爺們當開路先鋒一樣，也會是推動民進黨中國政策的重要力量。

在重力（阻力）上，來自堅持中國是台灣主權和獨立建國最大障礙的陣營，或可稱為獨派或是深綠，仍會扮演黨內中國政策的煞車板。另外台獨黨綱的存在也會牽絆中國與民進黨發展良好關係。再來便是陳水扁因素，陳水扁繼續被監禁不只是台灣內部藍綠難以良性互動的障礙之一，也會是深綠或是獨派無法卸下心防和怨恨與中國交往的關鍵因素。另外來自美國是否樂於見到台灣朝野都與中國交好的疑慮，也會是許多民進黨人士三思而行的重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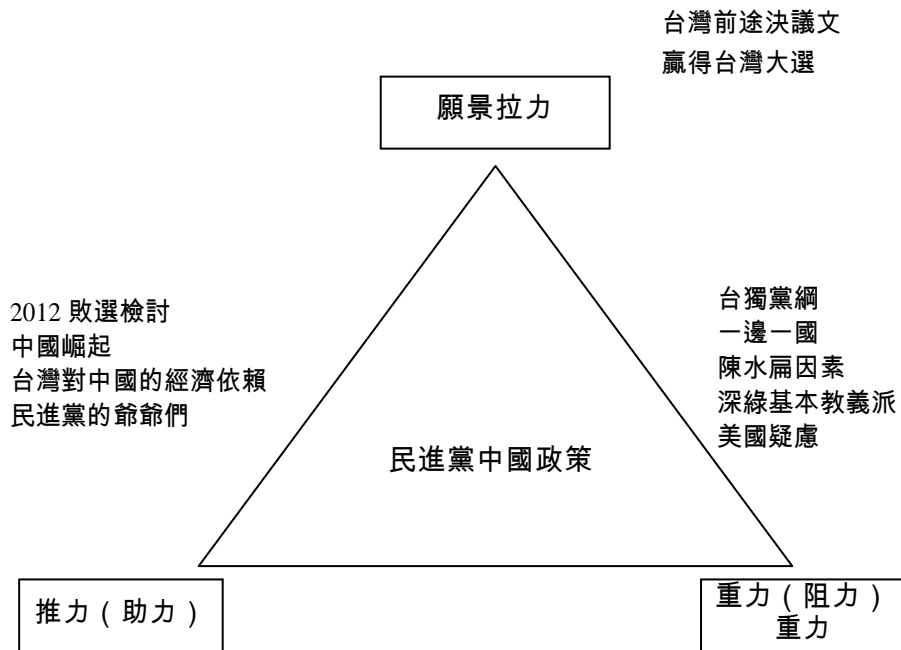


圖 3：民進黨中國政策之未來三角

陸、結語

本文無意在民進黨各種中國政策論述的細節上，作細部或個人化之分析，而是期望以未來學提供的方法與視角，嘗試進行不同面向之討論，因此以多層次因果分析解剖其縱深，再以時間觀探討問題糾結之所在，並試圖描繪可能之未來情境，最後以未來三角列出達成民進黨未來願景之拉力、推力、與重力。

2012 年將會是民進黨歷史指標性的一年，因為民進黨首次在重大選舉上，在國家認同與中國政策上被迫居於守勢，甚至是居於劣勢。民進黨不願意承認有 92 共識的存在，但也掉入共識的泥沼中，企圖以其他共識來建立與中國接軌對話的基礎，這些共識有些著眼於國內的共識達成，也有進一步就想與中國求得公約數的計算。共識本身是個弔詭的概念和目標，許多人談共識是在強壓對手接受自己的意見。因此建構共識經常因有人堅持

獲得較大的利益，而不願讓出一些利益而失敗。如果能協商出一個雖不滿意但可接受的結果，應該是較是實際的期待。

2008 年筆者討論民進黨的四個可能未來，第一種民進黨的可能未來是現狀持續，即民進黨扮演第一大反對黨，雖然有力量挑戰國民黨的政策，但是卻是沒有能力加以改變，簡單地說，可以干擾但是無力撼動國民黨執政的絕對優勢。第二種可能的未來是成為與國民黨輪替執政的主要政黨，鞏固台灣兩大黨的制度。第三種可能是大角度地轉型，強化台獨是民進黨的既定精神及方向，轉型的可能性在於對中國態度的大翻轉，更積極地以非統非獨地方式與國民黨爭取對中國的開創性作為。第四種可能則是完全衰退到成為泡沫，幾乎退出台灣的政治版圖。這種可能性來自民進黨分崩離析，民進黨這三個字被徹底放棄，有能力者另起爐灶整合反對勢力，或是所謂的台灣本土力量（紀舜傑，2008）。

雖然目前仍難以定論民進黨是走在上述那個可能未來中，不過 2012 年敗選後，似乎讓第三種未來的可能性增強。其實民進黨至今仍未將敗選原因發布深刻的檢討報告，通常敗選檢討不外從政黨、政策、和候選人三個層面下手，但是我們看到民進黨似乎急著拋開檢討，快速地為下一次大選做好個人或派系布局。也因為如此，讓民進黨支持者和台灣社會理所當然地認定就是中國因素導致敗選。民進黨應該以台灣的職棒為借鏡，台灣職棒曾經是全民擁戴的重要寄託，也曾失足幾次重重傷害球迷（選民）的心，大選來時，就像棒球經典賽一樣，又重新燃起全民的熱情，但是比賽後，因為失敗而糗態百出，讓球迷們再度恨鐵不成鋼。任何球賽訓練準備都得從基本功下手，政黨經營也是，訓練是辛苦不為人知，集訓期間不會有掌聲，球員必須忍住各種苦練和拒絕誘惑，才能在比賽時大放異彩。再者，球賽都是團隊合作的競技，只有凸顯個人可能造就短暫光芒，然而歸屬於敗隊，再如何強大的投手還是得不到勝投。民進黨的菁英們一定理解這些道理。

附錄：『民進黨台灣前途決議文』（1999）*

壹、前言

經由民主進步黨與全民多年共同艱辛奮鬥，逼使國民黨放棄戒嚴與一黨專政，接受民主改革，達成一九九二年的國會全面改選、一九九六年的總統直接民選、以及修憲廢省等政治改造工程，已使台灣事實上成為民主獨立國家。為總結過去的成就與經驗，因應新形勢與新環境，展望未來可能之發展與願景，本黨除繼續推動國家體制的改造，並應進一步詮釋台灣的定位與走向，向各界表明本黨現階段對台灣前途的看法與主張，俾能在既有的基礎與成就上，迎向新世紀的挑戰。

貳、主張

- 第一、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
- 第二、台灣並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片面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與「一國兩制」根本不適用於台灣。
- 第三、台灣應廣泛參與國際社會，並以尋求國際承認、加入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為奮鬥努力的目標。
- 第四、台灣應揚棄「一個中國」的主張，以避免國際社會的認知混淆，授予中國併吞的藉口。
- 第五、台灣應儘速完成公民投票的法制化工程，以落實直接民權，並於必要時藉以凝聚國民共識、表達全民意志。
- 第六、台灣朝野各界應不分黨派，在對外政策上建立共識，整合有限資源，以面對中國的打壓及野心。

* 民主進步黨 (n.d.)。

第七、台灣與中國應透過全方位對話，尋求深切互相了解與經貿互惠合作，建立和平架構，以期達成雙方長期的穩定與和平。

參、說明

主權的獨立與自主，是國家安全、社會發展及人民幸福的前提。台灣主權獨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既是歷史事實，也是現實狀態。這不但是台灣生存的條件，也是發展民主政治與創造經濟奇蹟的依憑。

民主進步黨於一九九一年藉著冷戰體制瓦解，自由、民主、自決思潮全面獲勝之際，通過黨綱修改，主張台灣主權獨立，提出重新界定國家領域、修改憲政體制、發展新國民意識等三項主張。當時雖然被打壓成異端，但不到十年，台灣主權獨立已經成為社會共識，其延伸的具體主張，也迅速成為憲政體制及法令規章的血肉。

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其主權領域僅及於台澎金馬與其附屬島嶼，以及符合國際法規定之領海與鄰接水域。台灣，固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都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

在上述社會新共識下，對外，我國不再堅持使用「中華民國」，並以各種不同名稱，廣泛參與各類官方及非官方國際組織；對內，則在打破國民黨「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迷思後，從事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凍省廢省等憲政改造工程。在發展新國民意識上，我們亦推動了國民教育教材的本土化，重塑了國民對台灣歷史文化的認知。一九九八年，更制定「領海法」，界定領土領海的範圍，並宣布不再禁止以台灣做為全國性社團的名稱。台灣主權獨立的原則到此全面展現其優越性，並獲得結論性的規範力。一九九一年黨綱的前瞻性已獲得充份證明。

在一九九九年的今天，體制改造雖然未竟全功，但朝野在國家認同上水火冰炭的尖銳衝突漸趨緩和，開啟了一致對外的新契機。如今，在面對中國的壓力時，朝野的差異已從國家認同的價值層面，縮小至確保國家安全與主權獨立的政策層面。

冷戰的結束、自由民主思潮的全面勝利、台灣的民主化及民意反對統一的比例不斷上揚，都是維護台灣主權獨立現狀及提升國際地位的有力因素。但另一方面，中國國力更為顯著的上揚及持續僵化的霸權思想，則是台灣前途的重大障礙。民主進步黨認為，在波譎雲詭的國際政治及諸般利害因素的交錯下，台灣必須審時度勢，妥善規劃安全、謹慎、漸進的中國政策。

民主進步黨認為，在全球要求和解、穩定與繁榮的氣氛下，台、中雙方不可能永遠自絕於時代潮流；兩個在地緣上相近、經濟上互利、文化上共源的國家，也不可能永遠互相仇視、互設門檻。民主進步黨中國政策的最終目標，是要和中國建立互惠而非歧視、和平而非衝突、對等而非從屬的關係。民主進步黨希望，中國政府能正視台灣人民的意願及台灣主權獨立的歷史事實，也希望中國人民能擺脫過時的民族主義及思想框架，真誠體會台灣人民要求獨立自主，在自由民主體制下繁榮發展的強烈意願。民主進步黨更希望，在即將到來的新世紀中，台、中雙方能拋棄猜疑與對立，從雙方在歷史上、文化上、血緣上的長遠關係出發，從地緣政治、區域穩定、經濟利益著眼，創造共生共榮、互信互利的美好前景。

參考書目

- 于卓民、巫立宇、蕭富峰，2009。《國際行銷學》，台北：智勝出版公司。
- 中國時報，2012。〈諷謝長廷 蘇：為選舉親中 那就去國民黨〉11月24日(<http://news.chinatimes.com/politics/11050202/112012112400110.html>)(2013/02/21)。
- 民主進步黨，n.d.。〈黨綱〉(http://www.dpp.org.tw/upload/history/20100604120114_link.pdf)(2013/03/05)。
- 自由時報，2010。〈民進黨中國戰略：堅持自由民主人權〉12月21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dec/21/today-p9.htm>)(2013/03/04)。
- 紀舜傑，2008。〈民進黨的崩壞或再起〉《中國時報》(<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112008112000155,00.html>)(2008/12/31)。
- 袁紅冰，2012。《被囚禁的台灣：國共聯手構陷本土政權陰謀侵吞台灣》。台北：杜威出版社。
- 唐德剛，1998。《晚清七十年》。台北：遠流出版社。
- 黃仁宇，1985。《萬曆十五年》。台北：食貨出版社。
- 新頭殼，2013。〈再論憲法各表 謝長廷：兩岸互不隸屬〉(<http://newtalk.tw/news/2013/01/04/32552.html>)(2013/03/05)。
- Dator, Jim. 1998. "The Future Lies Behind." (<http://www.futures.hawaii.edu/publications/futures-studies/FutureLiesBehind1990.pdf>) (2012/08/30).
- Foucault, Michael. 1973.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Galtung, Johan. 1996. *Peace by Peaceful Means: Peace and Conflict, Development and Civilization*. London: Sage Publishing Ltd.
- Inayatullah, Sohail. 2004. *The Causal Layered Analysis Reader*. Taipei: Tamkang University Press.
- Malinowski, Bronislaw. 1944. *A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Pluck, Graham, Kwang-Hyuk Lee, Hannah E. Lauder, James M. Fox, Sean A. Spence, and Randolph W. Parks. 2008. "Time Perspective, Depression, and Substance Misuse among the Homeless."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142, No. 2, pp. 159-69.
- Slaughter, Richard. 2001. *The Knowledge Base of Futures Studies*, CD Rom. Melbourne: Foresight International.
- Zimbardo, Philip, and John Boyd. 2008. *The Time Paradox: The New Psychology of Time That Will Change Your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CLA on DPP's China Policy

Shun-jie Ji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Futures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Tamsui, New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he defeat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2012 seemed to open the gate to China's interaction for DPP. Right after the election, many forums were held to research all issues of China and formal institution and agency was built within DPP to deal with this long time antagonist. China studies became one of the major agenda for DPP's future. Looking through rational and unbiased lens to this great power was unprecedentedly taken as very appropriate approach for DPP to remain competitive with the KMT in the future. This article uses Causal Layered Analysis (CLA) to explore the very essence of DPP's China policy. Additionally, four scenarios of the DPP-China future interaction were drawn to deepen this discussion, they are business as usual, growth, collapse, and transformation. The conclusion is DPP should clearly bring up its vision for Taiwan and China relations, followed by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lanning. It will be problematic to be driven by the anxiety of developing immediate contact with China to make reckless policies.

Keywords: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2012, DPP, China Policy, CLA